

自由与资本主义

——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

演讲者 乌尔里希·贝克

演讲者 约翰内斯·威尔姆斯

路国林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译者序

近年来，全球化理论大行其道。全球化理论与其说是某个流派的学说，倒不如说是从全球的视角审视当代世界重大变化的各种观点和看法的统称。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往往不是简单地鼓吹或否定全球化，而是对西方的传统现代化理论进行探讨和清理。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著作触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以西方为范本的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乌尔里希·贝克和约翰内斯·威尔姆斯撰写的《自由与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乌尔里希·贝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概念，主要著作有《什么是全球化》、《风险社会》、《自由之子》、《反思性现代化》、《全球化的政治》、《世界社会的前景》等。

约翰内斯·威尔姆斯，德国著名的历史题材记者和编辑，现为《南德意志报》的执行编辑，出版过《德国病》等有影响力的著作。

《自由与资本主义》的主题是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和

制度在全球化时代所遇到的挑战及其前景。全书共分六章。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传统观念（包括制度观念）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提出并论述了“第二次现代化”的思想。

贝克认为，传统的社会学观念建立在三条原则的基础上：一是地域性，即主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考察。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些新的原则以来，社会科学界便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倾向，民族国家构成了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地域来界定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从不同方面造就并强化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特征。二是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处的环境，隶属于既定的社会集体，如家庭、阶级乃至民族等等。三是进化的原则，相信社会所取得任何成果都意味着进步。

在贝克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交往的频繁化，意味着跨国性的交融和网络化，它改变了传统的模式，促成了一种不以地区、民族和疆域来界定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的特征在于经济力量的强大、政治塑造力量的削弱和世界主义文化的兴起。

目前，经济力量拥有跨国活动的能力，能够借助信息技术克服距离造成的障碍，不再像往常那样受制于民族国家，许多跨国企业已很难说属于某个国家，由于资本外逃日益加剧，国家已经无法动用调节手段来维护生产的增长，面对大规模的资本国际运动，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

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这一事实决定了国家受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国家不能推行任何违背大企业利益和资本主义生活条件的社会政策。在许多其他事务上也是如此。

与此相应，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变得日益广泛和密切，个人的生活空间日趋多样化，可以“同时”在多个地域、多样性的社会集体中生活，并形成了某些新型的社会关系。各种文化的特性和共性受到重新评价，并开始形成世界主义文化。世界主义文化所承认的不是趋同，不是西方化，而是文化差别的普遍性。地域观念、社会集体观念成为需要重新认识的领域。

就发展观而言，发展必然有益的观念是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而产生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进步加深了这种观念。近代以来的发展观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作了明确的划分，把发展的意义视为人的力量的扩张和统治自然的能力的扩张。这种发展观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表现为通过认识自然界因果现象不断地扩大对自然界的统治和超过同类；表现为个人从门第、派别、等级中解放出来，从压抑思想和感情的规则中解放出来；表现为经济从宗教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现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民主观念。这种发展观念及其表现形式现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

当代西方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和一些始料未及的风险或者说“副作用”。民

族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削弱，但缺少世界性的机构来弥补这个“权力真空”，经济力量的活动尤其得不到跨国性机制的约束，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重大后果，而且这些后果的影响程度和范围越来越难以界定；个人获得了自由，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松动，但是，社会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民主，充分就业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一起，曾构成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竞争中的有力支柱，而在今天就业危机已经变得日益严重；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空间，个别地区发生的事件因而也就波及整个世界。

有鉴于此，贝克提出并论述了第二次现代化的观点，这也是贯穿贝克全部思想的核心观点。按照贝克的看法，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在于，让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以便就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前提、道路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作者接着用了四章的篇幅具体探讨了现代化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劳动社会等领域的具体表现，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理性和劳动社会的两面性，讨论了有可能摆脱目前困境的途径，并且分析了全球治理的趋势及其可能遇到的种种限制。这里不必细说。

最后，作者针对现代化的困境，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要求，指出第二次启蒙的实质不在于把自己的真理解释为普遍真理，而在于促使人们去弄清各种文化的不同之处，将各种文化的差异之处联系起来，学会在多样性中生活，并有所创造。

该书是以对话或访谈录的形式写成的，主要是威尔姆斯提问，贝克回答，基本上是按照贝克近年来的著述展开的。书中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贝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主要著作，可以说是对贝克的重要观点的系统整理和概述。

当前与全球化、现代化相关的话题很多，大多数著书的内容限于某个话题或某个话题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些话题是相互关联的。该书的特色就在于把有关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系统而条理地考察，这对于理解与全球化有关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交锋是很有益处的。此外，由于贝克是位思想型的学者，思想独到，语言艰深，他的著作往往不易阅读和理解，因此，这本书对于理解贝克的其他著作，对于理解贝克分析和思考全球化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想必能够起到导读的作用。

译者翻译该书时得到了中央编译局薛晓源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致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译者水平所限，翻译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总 序

薛晓源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繁忙，终于坐下来为这套学术对话译丛写序言了，心里感慨万千。上个月好友从家乡来，谈及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他非常惊讶我在这么好的中央学术机关呆着，不全心全意从事严肃的学术工作，而花大量的力气和时间从事译介和出版工作。

我略微思考一下，这样回答他的惊讶：出版界出版的国外的学术书很多，然而也很滥，很多在西方是昙花一现的书，在我们这里却被奉为圭臬，很多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书，坊间却久久不见译本，我本人是个“书虫”，酷爱图书，很多朋友包括国外的出版社及其代理商，知道我的嗜好，经常寄书和发送图书信息，我在畅游书海之余，常为其他读者遗憾。

1999年夏季，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育海和编辑李宁来京，得知我手中有那么多好书，就鼓动我精选一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愿意购置版权。面对他们的热情和敬业精神，我无法推辞。接下来便是紧张的选书工作，我们经过反复商榷，确定以下四条为选书标准：第

一,所遴选的著作必须是当代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主流作品;第二,作者必须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人物;第三,每本书是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他学科,整套丛书是跨学科的;第四,最好是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展示各学科、各领域的大师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洞见和超前性的预警。

前三条标准还便于操作,最后一条却是知易行难。经过反复思考和大量筛选,终于寻找到用“对话”形式去切入这四条严格的标准。“对话”这种形式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对话”这个词语经常挂在人们嘴边,后来,渐渐式微了。现在这种文体和形式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西方历史上,对话体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许多脍炙人口的言行,大多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柏拉图用生动的语言和传神的笔调录下了苏格拉底深邃的思想。用对话形式去解说深邃的思想,根据希腊文学家的考证,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盛行,这种追问真理的方式浸润已久,渗透到希腊语言中去了,“辩证法”在希腊语中意思为“对话”或“谈话”。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名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指出:“古希腊哲学家们将‘对话的艺术’(dialogue)作为推理的一种方法;的确如此,柏拉图将它视为他所称之为‘科学’的真理知识的惟一可靠的方法。”

由此可见,用对话的形式去追问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西方学术大师

对这种优良的传统有着很好的继承。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卫星电视和英特网的普及,图像时代真正来临了,“对话”的程度、广度、速度、影响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央电视台的“对话”和“实话实说”节目影响巨大,现场直播往往是万人空巷。本丛书所选的四本书,其中三本书是电视记者采访大师的实录,尤其是记者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双方约定:事先不做任何准备,现场直播,问者与答者针对各自感兴趣的重大问题即兴发挥,双方在电视观众面前共同经历一场智慧与解释的“冒险”。

有鉴于此,我是这样理解和评估“对话”这种言说和叙事方式的:第一,对话就如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个体存在追问真理的一种方式,是真理的“催生婆”。第二,对话就是使对话双方真正置身于“互相面临、互相对峙”的语境中。第三,对话的本质就是对话双方的相互“诘难”,由简及难、由俗及雅,循序渐进,使真理敞现,使个体澄明。第四,对话最为实际的功能就是提供一条通往艰涩深邃思想宝藏的“林间小道”,借助于它不必再恐惧思想艰深的迷途,不必在歧路丛生的学术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仅举两例说明:君特·格拉斯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是 199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西方媒体誉为是“继托马斯·曼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德国语言大师”。但是,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是寓意晦涩,艰深难懂,使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每次都浅尝辄止,望而却步。哈贝马斯是当今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是法兰

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今年夏天来中国访问讲学,在北京和上海引起强烈轰动。但是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郭官义先生在《认识与兴趣 译者前言》中说:“哈贝马斯的理论著作晦涩难懂,这是他的读者公认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论题极为广泛,他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德国哲学传统语言的抽象性和深奥性,还因为他在论述时大量使用了自己独创的新词汇、术语和概念。”因此,英国社会学家彼得·威尔比把阅读哈贝马斯著作之艰难比作“奋力登山”。然而,通过“对话”形式去解读格拉斯、哈贝马斯作品和著作,是一条值得信赖的捷径,这也是我主编这套译丛的良好愿望。

经过艰难的选择,“当代西方学术对话译丛”第一辑择定四本:《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对话》,《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思想的盛宴——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细心的读者马上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套丛书第一辑所选著作均是德语世界的作品?在这里我要作一些说明:一是我个人比较偏爱德语思想和文化,其学术思想深邃性和前瞻性最具明显;二是其他语种的版权联系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其他原因,未能及时到位。我想留下的缺憾只能由第二辑来补偿了。最后,再次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位译者的鼎力帮助。

出版前言

对话作为一种知识语体，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伟大的哲人运用对话这种形式来展示其滔滔辩才和深邃的哲思。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托苏格拉底之名的睿智之思，大多是以对话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在这以后，西方学术界薪火相传，有许多名人大师用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电视、英特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图像世界”。社会问题的丛生以及传媒的快速和便捷，使得“脱口秀”、“对话”、“实话实说”等面对面的即时互动的节目类型应运而生。许多著名学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热闹的电视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发问的观众和主持人，直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与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即时互动，反响强烈。相比其他形式的电视节目，这类对话节目最适宜于以书的形式再现，而本译丛就是从这类书中遴选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原作者所固有的文化背景、分析

问题的视角和立场，使得书中的一些论点和对问题的分析，难免有偏颇之处。关于这一点，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加以理性评判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是给中国学术界、读者提供了解和认识西方当代思想发展的知识语境和文化资源，含英咀华，从而推动我们自己的学术进步。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八月

在我看来，要在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作出区分，关键在于那些僵死的范畴已僵死到了极点，另外，相应地还出现了僵死的机制。

对全球化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同关于民族国家“集装箱”的看法相互补充的理解，另一种是取代这种看法的理解。只要人们确定，民族国家仍在占主导地位，全球化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一种补充性的视角……

我对第二次现代化的诊断是，民族国家“集装箱”会自行解体，获得另外一种性质，使得我们形成有关跨国性的流通、生活方式、交流关系的新观念，使得在各民族国家、各地区、各组织内部，即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在经济领域、劳动领域、社会网络、政治组织内产生出各种机制。

威尔姆斯 以下简称“威”雪请您允许我们在开场时谈谈社会学的意义与用处,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芽

贝克 以下简称“贝”雪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是描述社会分析的。但随之问题就有所转移了:“社会”是什么芽它是什么意思芽人们是无法嗅到、看到、触到和尝到社会的。

威:请原谅,可是人们毕竟要到摩肩接踵的大街上去,要到足球场或小酒馆去,会印象鲜明地感触到社会。

贝:是的,可“摩肩接踵”恰恰不是社会学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东西。一个待在安安静静的家中读书的人,也属于社会的范畴。也许这个人出身于所谓的有教养阶层,攻读过浪漫派这一专业;要么就是不得不写一篇书评,以便糊口。社会学当作社会来分析的东西,总会被社会自我呈现出来的方式所扭曲。社会学处理的不是僵死的素材——就像化学家所做的那样,不是可顺顺当当地塞进“试管”里,加以科学性解释的东西。社会是由工会、政党、穷人和富人等等组成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社会成员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来澄清与辩解自己的地位。他们或实质上已经有所领会,或无论如何都做得自己仿佛已经有所领会一般。与此相反,社会学要形成自身对“社会”的理解。无论“社会”是什么,首先要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中得到理解。相对于常识来说,这一框架常常显得很抽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是不可被

直接感知的,它同社会成员的自我解释是相抵触的。

同时,社会仿佛模糊不定的庞然大物一般无处不在,对许许多多的事情负有责任。如果有人偷了东西,人们问起此事时,就常常会听到说,不该由窃贼对自己负责,而该由社会对他负责,是社会把他变成了窃贼。涉及社会学的是活灵活现的外行社会学家,这些外行社会学家多多少少都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就是在这些外行社会学家的影响之下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所有这些使得社会学如此地混乱不堪,像着了魔一般,并常常令人格外恼火,也使得社会学是如此有趣和激动人心。

威 我们可否作出一个略带论战性的论断,即社会学把自身理解为政治决策者的辅助性科学芽

贝 想必许多社会学家不是这样看的。实际上,即使个别社会学家持反对意见,社会学同国家、政治权威的联系也是既定的。值得注意的还有,社会学分析的不是一般社会,而是各种社会。所以,我们碰到的只能是一个德国社会、一个法国社会、一个美国社会、一个伊朗社会、一个日本社会等等。这就是说,有多少民族国家,就有多少社会。在社会学通常的理解中,各个社会都是依民族国家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充当了社会的缔造者、监控者、庇护者。各个社会都被设想为承受者,它们是在国家的势力范围内产生并延续的。这种看法将社会同民族国家等量齐观,认为社会在地域上是有限的,它深深地切入了社会学的认识、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的视角。可以说,它切

入了社会学的想象。民族国家成了社会学的感知背景。由此，人们才可能谈到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这一重要假设意味着：人类在一段有限的时间里分裂为各个民族，各个民族都在培养与经历自身的统一性文化，这种文化维系着民族国家。将这些挪移到社会学中来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着眼点是民族国家。正是对各个社会的民族国家式的考察方式带来了这种着眼点。

威 这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有何意义芽

贝 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得以应用之际，它的重要性完全是未经质疑的。由国家来规整和限定的社会领域被设想为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社会进行社会学诊断所必需的各种重要过程和条件都会反映出来，或得以发现。社会学家们总在分析他们的社会，尽可能地将他们所处的社会同其他社会进行比较，随后由此推论出社会之一般。迪尔凯姆是这样做的，他目睹法国的状况，基于“是什么在维系现代各个社会”这样一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即某种“有机的团结”是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冯克斯·韦伯也是这样，他在谈到官僚主义与目的合理性时，考虑的主要是世纪之交时的普鲁士管理机构。

威 人们从自己那个社会的经验中阐发出一些概念，随后将这些概念套用到有着不同历史进程和形态的各个

社会上,这样做在方法上难道不是很成问题的吗?

贝:实际上,这是某种西方式的概念至上论,它总是受到强调,又总是受到批评,它在方法论上肯定是极其成问题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做法最初是极富成效的。以打上了社会学烙印的历次大规模讨论为例,从孔德、迪尔凯姆、齐美尔直至马克斯·韦伯,所有概念均源于欧洲的经验领域,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普遍性经验。

同时,这些概念掩盖了“西方理性主义”。马克斯·韦伯语言中的概念至上论。同样,对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也曾影响过、目前仍在影响着形成中的欧洲民族意识,而人们对它的意义也讳莫如深。这段上百年的屈辱至今都在毒害着所谓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极其必要的对话。对于许多欧洲以外的经验领域来说,“全球化”只不过在美化某种新形式的剥削与帝国主义,即世界市场的专制。

威:回过头来看是这样的,但这不可归咎于这些事情的始作俑者。

贝:的确如此。就经典学者的经验领域来说,其特点在于,在我们做回顾时呈现为描述性概念的东西,对于当时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却是规范性的。

人们必须想象一下:社会学家,尤其是社会学的经典作家,实质上对某种并不存在的未来作出了表述,并起草了表述的体系。他们以有别于当时各种理论框架条件、